

物质性利益与情感性认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变迁

姜 韬^{1,2} 孙 云^{2,3} 易 亮^{1,2}

(1.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3.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是观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文基于两期“中国效应调查”的数据,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主要从物质性利益与情感性认同两个维度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展开实证研究。通过对相关因素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认同因素对“统独”立场具有显著影响,台湾认同越强者越可能支持“独立”,但5年来其影响力趋于弱化;利益因素对“统独”立场同样影响显著,从两岸关系发展中获益越多者越可能支持统一,但该影响在2016年已然消失;在2011与2016年两个时点,族群认同对“统独”立场的影响力均要强于经济利益的影响力,现阶段大陆的经济“让利”还不足以压制台湾民众的“自尊”需求。这些发现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提供了若干思路与方向。

关键词:物质利益;族群认同;民族主义“统独”立场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6-009-09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6.002

一、问题的提出

2008~2016年马英九当政期间是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阶段,8年里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果,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然而,在热络交往的大背景下,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整体态度似乎并未发生重大转变,甚至还显示出恶化趋势。比如,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以及2016年蔡英文的胜选。那么,在这些现象背后,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各相关因素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一项观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的重要风向性指标,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长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仅由此发轫的各类民调数据层出不穷,而且围绕其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这些视角不同、方式各异的研究存在本身就表明左右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因素极为复杂。若从内外因的角度考虑,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主要是受中国大陆因素与台湾本土因素的双重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JJDGAT003)

作者简介:姜 韬,男,本文通讯作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孙 云,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大理论平台执行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

易 亮,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约。就前者而言,震慑加吸引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即对“台独”的武力震慑加上对民众的经济吸引;以后者而论,在地认同需求占据着重要地位,即已成主流的台湾人认同倾向。显然,两者的性质存在很大差异:一个物质性色彩较重,一个情感性色彩颇浓。借鉴台湾学者吴乃德的比喻,就是面包与爱情的冲突。而本文正是从这两个面向出发,以两期“中国效应调查”的数据为依托,对相关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中国效应调查”由台湾地区“中研院”发起、张茂桂教授主持,设计初衷在于观察和记录大陆崛起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从2011年初开始至2016年初为止,调查共进行了5次,除2014年外每年一次。本文选取的是其中的2011年与2016年数据。两期调查的时间跨度为5年,基本涵盖马英九当政期间,范围涉及全台25个县市,利用CATI系统,采取RDD-PPS抽样法,分别获得1 217份与1 226份数据样本。整个过程从设计实施到数据检核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客观中立性,可以作为研究相关问题的数据来源。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从本质上看,所谓的统独立场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其核心目标是寻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围绕民族主义大致存有两组对立的理论观点,即理性选择论与感性认同论。前者视民族主义为物质利益的算计,后者则将其当作原初的情感需求。当然,人类的行为多半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两类动机彼此交织、难以分割,这点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就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多项民调数据显示,^[1]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的20余年时间,岛内台湾人认同比例持续上升,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期间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分布却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依旧偏向于“维持现状”。如果说其中没有物质利益的算计(大陆的武力震慑和经济吸引),恐怕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可见,对两类理论观点的把握更多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就某一特定现象,比如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探讨谁的解释力更大的问题。对此,相关文献主要提供了以下观点:

第一类文献的落脚点在认同,大多都未直接触及“统独”立场,而是通过解析台湾人认同的方式间接予以阐明。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台湾人/中国人认同与“统独”立场存在比较密切的关联,即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群体要比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群体更倾向统一。这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半取自社会心理学。例如,陈孔立教授认为,“台湾人认同”是为了满足台湾民众提升自尊的需求,但这种自尊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社会比较实现的,必然出现“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会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不利影响。^[2]类似地,孙云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的认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过程,其基本趋向就是在把台湾建构成‘我群’的同时,逐渐将中国建构为‘他者’,并使二者产生某种异己关系、对立关系”。^[3]不过,从认同到“统独”绝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首先,认同属于一个主观色彩很浓的概念,这导致其研究面向存在一定的多维性,可以划分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党认同等等,而且很多面向间缺少统一明确的分类标准。比如,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到底属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抑或国族认同就存在不小的争议。其次,不少学者研究发现认同与“统独”难以简单对应。例如,吴玉山认为台湾认同的强化并没有转化为对于“台独”的诉求,民众对于台湾的未来仍旧保持着中间立场;^[4]节大磊指出“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为台湾人,他们关于统独的政策认同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务实中庸的”。^[5]

第二类文献的落脚点在利益,主要关注大陆因素对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影响。前文提到,当前大陆对台政策以武力震慑和经济吸引的模式为主。由此出发,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多数台湾民众是实用派,他们的“统独”立场主要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例如,Emerson M.S.Niou将“台独引发的后果”与“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作为变量引入“统独”民调后发现,超过四成的台湾民众具有“条件性偏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6]郑振清、段哲哲与杨子申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发

现两岸经贸交流利益对台湾民众的“九二共识”支持态度影响显著,但大陆的军事威慑却未对此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7]陈陆辉和耿曙则认为“相对于上一辈或者上上辈对‘统独’更加两极化的态度,台湾年轻人显得更加‘中庸’,更愿意考虑未来的不同可能性。”^[8]

第三类文献关注物质利益、情感认同与“统独”立场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台湾学者吴乃德基于1998年与2000年的两次追踪访问调查发现,在相应时点就“统独”问题而言,情感性认同的吸力似乎要大于物质性利益的拉力。^[9]另外,近年来大陆快速崛起的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三者的互动。对此,陈孔立认为,台湾民众面对“中国大陆崛起”产生了一些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态度,有希望“不对抗、搞开放”的,有提倡“政治对抗、经济合作”的,还有主张“联合反制”的;^[10]沈惠平、邓小冬则发现了一种“恐中”情绪的蔓延,如对大陆“武力犯台”的恐惧、对大陆过度依赖的恐惧、对大陆崛起的恐惧。^[11]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可以将物质利益、情感认同与“统独”立场统合进一个系统内加以把握?对此,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或许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该理论将人类需求划分为若干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12]这些需求间存在明显的优先性,其中生理、安全与情感归属需求虽位于低阶层次但却是基本需求,只有它们得到满足才谈得上实现后面两类高级需求。并且,各类需求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重叠、依赖的关系。换言之,高级需求发展后,低级需求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可见,同一时期一个人完全可能存在几种需求,但总有一种需求占据支配地位,对态度和行为起决定作用。顺着这一逻辑回看本文的核心问题,其中,物质利益属于典型的低级需求,情感认同带有鲜明的高级需求属性,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则构成了相应的宏观背景。显然,对于早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台湾而言,高级需求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但低级需求的影响是否就微不足道或者日渐式微,恐怕也不尽然,尤其在两岸关系深入发展、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换句话说,一个对台湾怀有强烈族群认同的人,当他或他的家庭享受到越来越多源自大陆的“面包”时,他有多大可能继续坚守“爱情”?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三项研究假说:

假说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台湾认同越强者越可能支持“独立”;

假说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从两岸关系发展中获益越多者越可能支持统一;

假说3: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族群意识对“统独”立场的影响力要强于经济利益的影响力。

三、数据分析

(一) 变量设定与方法选择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为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但与通常的处理方式不同,为了排除“武力震慑”与“两岸差距”这两项现实条件的干扰以更好契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笔者借鉴了吴乃德等人的做法,利用两道题将受访群众细分为三组群体:1“台湾民族主义者”2现实主义者3“中国民族主义者”。具体方式为:根据受访者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不会引起战争的话,台湾就应该宣布‘独立’。请问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和“如果中国大陆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发展和台湾差不多,两岸就应该统一。请问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回答,将同意前问但不同意后问的受访者定义为“台湾民族主义者”,这类人无论大陆变得怎样都不愿两岸统一;将不同意前问但同意后问的受访者定义为“中国民族主义者”,这类人不愿“台独”即便由此不会引发战争;而将剩余受访者定义为“现实主义者”,这类人对于“统独”选项或是都能接受(只要各方面福祉得到保障),或是无所谓、没意见。由此,最终生成一个分类型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口特质,包括世代、父亲省籍和居住地域,均属于定类变量。其中,世代分成三组:1青年(18~29岁)^[13]2中青年(30~39岁)3中老年(40岁以上);父亲省籍分

成两组:1本省(合并闽南人、客家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三个类别)2外省;居住地域分成三组:1北部、东部与澎金马2中部3南部。^[14]第二类,社会经济地位,以教育程度为指标,被处理成包含三个类别的定序变量:高中及以下为1,高职、大专为2,大学及以上为3。第三类,政党认同,分为三组,包括1泛蓝阵营2中间阵营3泛绿阵营。

自变量有两个:经济影响与族群意识,分别代表物质性利益和情感性认同。以“目前为止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您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测量前者,以“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测量后者。两项变量在拟合模型时均视为连续变量,对应的选项与赋值分别是:1很坏的影响2坏的影响3没有影响、不知道4好的影响5很好的影响;1台湾人2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3中国人。

模型方面选用的是多项 logistic 回归。之所以选择该模型而弃用结果更易理解的 OLS 模型的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前期研究发现,如用 OLS 回归拟合模型会出现严重的异方差现象,而这不符合经典的高斯假定条件(这也是社科类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此得到的估计也将不再有效,但多项 logistic 回归却能很好地克服这一缺陷。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按年度分别设置3组相互对应的子模型,以进行纵/横向比较。3组模型均包含全部的控制变量,所不同的是模型1只加入“族群意识”自变量,模型2仅含有“经济影响”自变量,模型3则囊括所有自变量。如此处理有助于了解经济影响与族群意识这两个因素的相对影响。

(二)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统独”立场方面:2011~2016年间“现实主义者”的比例由50.8%下降至46.8%,但依旧是占比最大的群体。“台湾民族主义者”的比例由36.5%上升至39.2%,保持了第二大群体的位置。“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比例由11.5%上升至13.6%,占比位列第三。可见,5年里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分布并未发生太大改变。族群意识方面:两个时点的台湾人认同占比变化不大,均超过七成,处于绝对优势;主要变动反映在台湾人/中国人双重认同与中国人单一认同的占比上,前者从2011年的6.2%跃升至2016年的20.6%,后者则由13.5%下滑到8.1%。可见,5年里单一的中国人认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经济影响方面:相较2011年负面感人员超过正面感人员、无感人员占多数的局面,2016年感受到正面影响的人群占了主流,相应比例超过四成。可见,5年里大陆对台的经济利益输送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布

	“统独”立场			族群意识	
	2011年	2016年		2011年	2016年
“台湾民族主义者”	444(36.5%)	480(39.2%)	台湾人认同	885(72.7%)	861(70.2%)
现实主义者	619(50.8%)	574(46.8%)	中国人/台湾人认同	76(6.2%)	253(20.6%)
“中国民族主义者”	140(11.5%)	167(13.6%)	中国人认同	164(13.5%)	99(8.1%)
缺失值	14(1.2%)	5(0.4%)	缺失值	92(7.6%)	13(1.1%)
总计	1 217(100%)	1 226(100%)	总计	1 217(100%)	1 226(100%)
经济影响					
	2011年		2016年		
很坏的影响	134(11.0%)		76(6.2%)		
坏的影响	232(19.1%)		276(22.5%)		
没有影响、不知道	493(40.5%)		362(29.5%)		
好的影响	330(27.1%)		445(36.3%)		
很好的影响	22(1.8%)		66(5.4%)		
缺失值	6(0.5%)		1(0.1%)		
总计	1 217(100%)		1 226(100%)		

(三) 假设检验与分析结果

接下来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整理以建立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主要任务是将世代、父亲省籍、居住地域、受教育程度以及政党认同处理为虚拟变量。其中,父亲省籍分为:0 本省人,1 外省人,由于是二分变量,故无需设置专门的参照组;世代是以“中老年”为参照组设置 2 个虚拟变量:D-青年,D-中青年;居住地域属于三分变量,以“中部”为参照组设置虚拟变量:D-北部、东部与澎金马,D-南部;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参照组为“高中及以下”,对应 2 个虚拟变量:D-高职、大专,D-大学及以上;政党认同则以“中间阵营”为参照组设置 2 个虚拟变量:D-泛蓝,D-泛绿。按照前述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共得到不同时点下的 3 组模型,表 2 呈现了模型的主要数据。

先从纵向看,模型 1a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族群意识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影响显著:中国人认同每增加 1 个单位,民众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与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对数发生比要减小 0.776,即两种结果的优势比变为原来的 46.0%;而民众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相对于成为“现实主义者”的优势比提高了 92.8%;也就是说,中国人认同越强的人越不可能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但越可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这一符合常识的结论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模型 2a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同样会显著影响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家庭从两岸关系发展中获利越多的人越可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而越不可能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模型 3a 显示在包含所有变量的情况下,前述结论依然成立,即经济利益与族群意识均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影响显著。由此,假说 1 和假说 2 在 2011 年这个时点通过了检验。若从整体上把握这 3 个模型还可以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族群意识的引力要大于物质利益的拉力。这既是比较各伪相关系数 Nagelkerke 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模型 1a 的 Nagelkerke 要大于模型 2a,又是从各估计系数做出的判断,因为 3 个模型中族群意识的估计系数绝对值都超过经济利益的相应数值。由此可见,假说 3 在该时点也是成立的。第二,泛绿认同是促使民众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无论在哪个模型中,泛绿认同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均为最高,且其只在“台湾民族主义者”这一因变量类别中统计显著。第三,虽然族群意识是影响“统独”立场的重要因素,但世代也发挥着一定作用。比较模型 2a 与 3a 可以发现,即便是在加入族群意识以后,青年世代与“台湾民族主义者”的正向关联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统计显著性。第四,泛蓝认同对“台湾民族主义”的影响次于经济利益。这是比较模型 1a 与 3a 后得出的结论:一旦加入经济利益,泛蓝认同的显著性就会发生改变。第五,仅有族群意识和经济利益这两个变量才能显著影响台湾民众的“中国民族主义”。

模型 1b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族群意识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影响显著,具体结果与模型 1a 类似。可见,假说 1 在 2016 年依然成立。模型 2b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利益与“台湾民族主义”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模型 3b 显示在包含所有变量的情况下,前述结论依然成立。若从整体上把握这 3 个模型还可以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族群意识的引力要大于物质利益的拉力,其依据如前段所述。由此,假说 3 再次通过检验。第二,泛绿认同与世代是影响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最重要因素。区分因变量类别来看:在对应着“台湾民族主义者”的 3 个模型分部中,泛绿认同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均为最高;而在剩余的模型分部中,世代变量的相应数值均是最大。第三,泛蓝认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次于族群意识。这是比较模型 2b 与 3b 后得出的结论,一旦加入族群意识,泛蓝认同的显著性就会发生改变。第四,仅有父亲省籍和族群意识这两个变量才能显著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民族主义”。

从横向看,2015 年相比 2011 年出现 4 点变化:第一,尽管族群意识的引力依旧大于物质利益的拉力,但两者的估计系数绝对值都有减小。这意味着情感性认同与物质性利益对“统独”立场的影响在弱化,并且经济因素与“中国民族主义”间的关联已不再显著,其影响被限制在对“台湾民族主义”的负向效应上。因此,假说 2 在 2016 年不能成立。第二,世代成为影响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关键因素。40 岁以下的青年、中青年,尤其是青年群体不仅有较大可能成为“台湾民族主义

者”而且还对“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第三,泛绿认同的作用范围扩大。2011年泛绿认同的影响只限于提高民众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可能性,而5年后其范围延伸至“中国民族主义”领域,开始从两个方向同时左右“统独”立场。第四,显著影响“中国民族主义”的因素增多,省籍效应重新显现。第五,泛蓝认同的利益色彩变淡、情感色彩变浓。如前所述,2011年泛蓝认同的影响隐于经济利益之后,且只对“台湾民族主义”起反向作用,表明两者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在经济利益“缺场”时泛蓝认同能够部分取代它的位置,即泛蓝认同实利化;而2016年泛蓝认同的影响开始隐于族群意识之后,作用形式也转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向效应,这同样意味着泛蓝认同的情感化转向。

表2 经济影响与族群意识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 1a(2011)					模型 1b(2016)				
		B	S.E.	Exp			B	S.E.	Exp
“台湾民族主义者”	截距	0.703***	0.257		“台湾民族主义者”	截距	0.129	0.272	
	D-青年	0.258	0.202	1.294		D-青年	0.649***	0.225	1.914
	D-中青年	0.276	0.189	1.318		D-中青年	0.464***	0.174	1.590
	D-泛蓝	-0.404**	0.172	0.668		D-泛蓝	-0.246	0.183	0.782
	D-泛绿	1.089***	0.174	2.973		D-泛绿	0.733***	0.155	2.082
	父亲省籍	-0.144	0.274	0.866		父亲省籍	0.068	0.226	1.070
	族群意识	-0.776***	0.148	0.460		族群意识	-0.502***	0.135	0.605
“中国民族主义者”	截距	-2.463***	0.355		“中国民族主义者”	截距	-2.372***	0.387	
	D-青年	-0.243	0.341	0.785		D-青年	-1.092**	0.544	0.336
	D-中青年	-0.115	0.272	0.891		D-中青年	-0.620**	0.306	0.538
	D-泛蓝	0.002	0.230	1.002		D-泛蓝	0.310	0.215	1.363
	D-泛绿	0.303	0.310	1.354		D-泛绿	-0.538*	0.294	0.584
	父亲省籍	-0.064	0.294	0.938		父亲省籍	0.424*	0.243	1.528
	族群意识	0.656***	0.121	1.928		族群意识	0.530***	0.136	1.699
Nagelkerke		0.220			Nagelkerke		0.198		
模型 2a(2011)					模型 2b(2016)				
		B	S.E.	Exp			B	S.E.	Exp
“台湾民族主义者”	截距	0.665**	0.265		“台湾民族主义者”	截距	0.193	0.296	
	D-青年	0.505**	0.201	1.657		D-青年	0.750***	0.222	2.116
	D-中青年	0.367**	0.186	1.443		D-中青年	0.475***	0.174	1.608
	D-泛蓝	-0.267	0.171	0.766		D-泛蓝	-0.251	0.182	0.778
	D-泛绿	1.143***	0.173	3.136		D-泛绿	0.755***	0.154	2.127
	父亲省籍	-0.416	0.261	0.660		父亲省籍	-0.088	0.220	0.916
	经济利益	-0.427***	0.076	0.653		经济利益	-0.230***	0.068	0.795

续表

模型 3a(2011)					模型 3b(2016)				
		B	S.E.	Exp		B	S.E.	Exp	
“中国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2.631 ***	0.442		“中国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1.744 ***	0.457	
	D-青年	-0.524	0.320	0.592		D-青年	-1.351 **	0.539	0.259
	D-中青年	-0.195	0.264	0.823		D-中青年	-0.732 **	0.303	0.481
	D-泛蓝	0.110	0.219	1.117		D-泛蓝	0.380 *	0.211	1.462
	D-泛绿	0.257	0.302	1.293		D-泛绿	-0.710 **	0.289	0.492
	父亲省籍	0.333	0.270	1.395		父亲省籍	0.591 **	0.234	1.805
	经济利益	0.356 ***	0.120	1.427		经济利益	0.063	0.102	1.065
Nagelkerke		0.193			Nagelkerke		0.173		
“台湾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1.609 ***	0.319		“台湾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0.720 **	0.334	
	D-青年	0.369 *	0.205	1.446		D-青年	0.677 ***	0.226	1.968
	D-中青年	0.311	0.192	1.364		D-中青年	0.452 **	0.175	1.571
	D-泛蓝	-0.234	0.178	0.792		D-泛蓝	-0.161	0.186	0.851
	D-泛绿	0.978 ***	0.178	2.658		D-泛绿	0.679 ***	0.156	1.973
	父亲省籍	-0.156	0.276	0.855		父亲省籍	0.049	0.227	1.050
	族群意识	-0.705 ***	0.149	0.494		族群意识	-0.459 ***	0.136	0.632
	经济利益	-0.398 ***	0.078	0.672		经济利益	-0.212 ***	0.068	0.809
“中国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3.291 ***	0.504		“中国 民族 主义者”	截距	-2.464 ***	0.505	
	D-青年	-0.320	0.343	0.726		D-青年	-1.104 **	0.544	0.332
	D-中青年	-0.110	0.273	0.896		D-中青年	-0.621 **	0.307	0.538
	D-泛蓝	-0.145	0.238	0.865		D-泛蓝	0.291	0.219	1.337
	D-泛绿	0.402	0.314	1.495		D-泛绿	-0.535 *	0.296	0.586
	父亲省籍	-0.035	0.295	0.965		父亲省籍	0.418 *	0.243	1.518
	族群意识	0.636 ***	0.122	1.890		族群意识	0.539 ***	0.137	1.714
	经济利益	0.298 **	0.125	1.347		经济利益	0.024	0.105	1.025
Nagelkerke		0.255			Nagelkerke		0.207		

注: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因变量的参照组为“现实主义者”; 为简化表格, 对检验不显著的控制变量进行了省略。

四、研究总结

本研究以两期“中国效应调查”为数据来源, 在对各变量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了物质性利益与情感性认同对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影响, 以此揭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变迁。根据前述分析提出以下结论与反思:

首先, 5 年间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分布较为稳定, 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员依旧占多数。他们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没有特定倾向, “统一”和“分裂”均可接受, 只要自身的利益能够获得保障。不过, 这种稳定可能只是表面现象, 它可能是因为在两次调查的时间节点上, 受访者同时发生立场转

换(既有“统一”立场转为“台独”立场,也有“台独”立场转为“统一”立场)导致变动被抵消所引发的结果。然而,由于两个时点的数据并非取自追踪样本,也就无法对此展开实证分析。这是本研究之不足之一。

其次,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并未扭转族群意识与物质利益的影响力对比,相较“面包”,台湾民众似乎更在意“爱情”,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相关逻辑。但两项因素对“统独”立场的影响均在弱化,并且经济利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向作用开始被省籍因素取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背负着格外的社会压力,非主流群体的维系更多要靠血缘、情感等深层因素,否则其成员完全可以选择随波逐流以换取更大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大陆的经济利好还没有达到能够左右台湾民众生活品质的程度,不足以压制自尊、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显然,“中国民族主义者”长期属于台湾社会的“少数派”,尤其是在“太阳花运动”以后,整个社会氛围更加不利于该群体的存续。此时,省籍、族群等血缘、情感类因素就容易压倒利益算计成为凝聚整个群体的纽带。另外,也不排除还有新的重要因素未纳入模型。因为相较2011年,2016年3个模型的Nagelkerke均更小,这表明两者的解释力存在差距,需要考虑在2016年的模型中引入新变量。

再次,与5年前相比,“中国民族主义”对于年轻世代的吸引力急剧衰退。其中虽有“太阳花运动”的影响,但更主要还是李扁时期“去中国化”教育结出的恶果。以2016年为时点,20~40岁的台湾年轻人出生于1976~1996年间,他们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基本是在李扁时期度过的,其两岸认知被严重扭曲,又在马英九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自然容易对中国大陆产生疏远、排斥心理。“随着代际更替,人们就统‘独’问题的立场整体上表现出更加富有灵活性、嬗变性和实用主义的趋势,但至第五代(生于1982~1990年间),该趋势开始转变,即有更高比例的人群开始明确偏向支持最终走向‘独立’的立场”。^[15]这绝非所谓的“天然独”,而是不折不扣的“人造独”,其转变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各方的长久努力。况且,台湾年轻世代的这种“独”还存在现实边界,那就是大陆的武力震慑。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利益制约,以维持整个社会“统独”分布的稳定。

最后,蓝绿认同与“统独”立场的关系性质存在很大差别。总体而言,泛绿认同属于能够对“统独”立场发挥独立影响的重要变量,并且5年来其作用范围明显扩大,可以同时“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起到正反向效应。但是,泛蓝认同却隐于经济利益和族群意识之后,作用有限,难以对“统独”立场产生独立影响,并且5年来还表现出从“实利化”到“情感化”的转向。这或许是因为泛蓝阵营的支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希望获得两岸经济发展红利的现实主义者;另一类是倾向两岸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当前类人在2016年转而支持绿营时,剩余的泛蓝支持者就相对单纯化了,于是便凸显出泛蓝认同的族群意识属性。

总之,本文通过对2011与2016年两个时点的截面数据分析,探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物质性利益、情感性认同与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关系演变。若从结论上看,8年来大陆的经济让利似乎未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产生积极影响。对此,应从多方面把握:一是要看到经济利益仍然对“台湾民族主义”具有负向效应,会增大民众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要明白物质吸引对于台湾这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影响有限,像苏格兰独立运动、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就多半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所以,推动两岸的情感交流、促进双方的心灵契合或许更为重要。当然,如果大陆的经济实力达到了足以左右台湾民众生活品质的程度,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由此带来的影响将大为不同。另外,研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以“自认为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来测量情感性认同的做法不够全面、严谨,由于这个维度的牵涉范围很广,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加以描述;同样,对物质性利益的测量也存在类似问题;还有,人数占比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统独”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是有偏好但被压抑,还是根本就持无所谓的态度,也是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

注释:

- [1]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主持的长期跟踪民调,详细内容的获取可访问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 [2] 陈孔立《自尊需求与“台湾人认同”》,《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2期。
- [3] 孙云《从“我群”到“他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转变的成因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
- [4] 吴玉山《两岸关系中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中国事务》2011年第4期。
- [5] 节大磊《台湾认同的迷思》,《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 [6] Niou, Emerson M.S. “Understand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2004, Vol.44, No.4 p.559.
- [7] 郑振清、段哲哲、杨子申《政治偏好、经济利益与威慑感知——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民众“九二共识”立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3期。
- [8] 陈陆辉、耿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载包宗和、吴玉山主编《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63-194页。转引自节大磊《台湾认同的迷思》,《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 [9] 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台北)2005年第2期。
- [10] 陈孔立《台湾民众面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
- [11] 沈惠平、邓小冬《浅析部分台湾民众的“恐中”情绪——一种群际情绪理论的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6期。
- [12]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346-348页。
- [13] 2011期调查该组别的覆盖区间是20-29岁。
- [14] 其中,“中部”包括台中市、台中县、彰化县和南投县。“南部”包括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市、高雄县、屏东县;剩余的各县市归入“北部、东部与澎金马”。
- [15] 王磊、林冈《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代际差异分析》,《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唐 桦)

Material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Identity: Changes of the Taiwan People's Position of the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Jiang Tao, Sun Yun, Yi Liang

Abstract: The Taiwan people's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observ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politic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wo “China Effect Survey” and the Maslow's Theory of Demand Lev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aiwan people's position of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terial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regression to multiple logistic, we find that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 variables, identity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stronger the identity of Taiwan,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support “independence”, but its influence tends to weake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hile similarly, interest factors als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osition and the more benefi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support it. However, the influence disappeared in 2016. Surprisingly,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identity on the posit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in 2011 and 2016. At this stage, the mainland's economic “profit giving” is not enough to outdo the “self-esteem” needs of Taiwan people. Anyway, these findings can provide some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 of Taiwan people's position of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terial interest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ism,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position